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且介亭杂文末编



《出关》的“关”

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2〕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话是不错的。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的受批评家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3〕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然而别一方面，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脸了，他戟指大叫道：“我们中国有半个托尔斯泰没有？有半个歌德没有？”惭愧得很，实在没有。不过其实也不必这么激昂，因为从地壳凝结，渐有生物以至现在，在俄国和德国，托尔斯泰和歌德也只有各一个。

我并没有遭着这种打击和恫吓，是万分幸福的，不过这回却想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来说几句话，这也并无他意，只以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咱们也不妨谈一谈而已。

看所有的批评，其中有两种，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缩得更小，或者简直封闭了。

一种，是以为《出关》在攻击某一个人。这些话，在朋友闲谈，随意说笑的时候，自然是无所不可的，但若形诸笔墨，昭示读者，自以为得了这作品的魂灵，却未免像后街阿狗的妈妈。她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隐私的。不幸我那《出关》并不合于这一流人的胃口，于是一种小报上批评道：“这好像是在讽刺傅东华，然而又不是。”〔4〕既然“然而又不是”，就可见并不“是在讽刺傅东华”了，这不是该从别处着眼了么？然而他因此又觉得毫无意味，一定要实在“是在讽刺傅东华”，这才尝出意味来。

这种看法的人们，是并不很少的，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使没有，就不成为小说。纵使写的是妖怪，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上相像。有谁相像，就是无意中取谁来做了模特儿，不过因为是无意中，所以也可以说是谁竟和书中的谁相像。我们的古人，是早觉得做小说要用模特儿的，记得有一部笔记，说施耐庵〔5〕——我们也姑且认为真有这作者罢——请画家画了一百零八条梁山泊上的好汉，贴在墙上，揣摩着各人的神情，写成了《水浒》。但这作者大约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俩，而不知道画家的能力，以为他倒能凭空创造，用不着模特儿来作标本了。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笑的角色，在现在的中国恐怕大抵要认为作者在报个人的私仇——叫作“个人主义”，有破坏“联合战线”之罪，从此很不容易做人〔6〕。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当初以为可以不触犯某一个人，

后来才知道倒触犯了一个以上，真是“悔之无及”，既然“无及”，也就不悔了。况且这方法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合，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

不过我在这里，并不说傅东华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儿，他一进小说，是有代表一种人物的资格的；我对于这资格，也毫无轻视之意，因为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霁〔7〕，《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8〕，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霁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里〔9〕：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还有一种，是以为《出关》乃是作者的自况，自况总得占点上风，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10〕。说得最凄惨的是邱韵铎〔11〕先生——“……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要是这样，那么，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了，我相信，鲁迅先生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是不在这里的。……”（《每周文学》的《海燕读后记》）这一来真是非同小可，许多人都“坠入孤独和悲哀去”，前面一个老子，青牛屁股后面一个作者，还有“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还有许多读者们连邱韵铎先生在内，竟一窠蜂似的涌“出关”去了。但是，倘使如此，老子就又不“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想他是会不再出关，回上海请我们吃饭，出题目征集文章，做道德五百万言的了。

所以我现在想站在关口，从老子的青牛屁股后面，挽留住“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以及许多读者们连邱韵铎先生在内。首先是请不要“坠入孤独和悲哀去”，因为“本意是不在这里”，邱先生是早知道的，但是没说出在那里，也许看不出在那里。倘是前者，真是“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了”；倘因后者，那么，却是我的文字坏，不够分明的传出“本意”的缘故。现在略说一点，算是敬扫一回两月以前“留在脑海里的影子”罢——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12〕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13〕；“儒者，柔也”〔14〕，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15〕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16〕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17〕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不料竟惹起邱先生的这样的凄惨，我想，这大约一定因为我的漫画化还不足够的缘故了，然而如果更将他的鼻子涂白，是不只“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而已的，所以也只好这样子。

再引一段邱韵铎先生的独白——“……我更相信，他们是一定会继续地运用他们的心力和笔力，倾注到更有利于社会变革方面，使凡是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来，加强起来，同时使凡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转为有利的力量，

以联结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一为而“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仅次于“无为而无不为”一等，我“们”是没有这种玄妙的本领的，而我“们”和邱先生不同之处却就在这里，我“们”并不“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而邱先生却会“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的关键也在这里。他起了有利于老子的心思，于是不禁写了“巨大无比”的抽象的封条，将我的无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闭了。但我疑心：邱韵铎先生以及像邱韵铎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也许倒只在这里的。

四月三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2〕《海燕》月刊。胡风、聂绀弩、萧军等创办，署史青文编。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在上海创刊，仅出两期即被查禁。《出关》发表于该刊第一期。

〔3〕“名利双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社会日报》第三版刊有署名黑二之《四马路来消息三则学学时髦姑名之曰文坛三部曲》中说：“《八月的田间》自鲁迅及鲁系诸人转辗相捧之后，作者田军名利双收”。

〔4〕关于《出关》是讽刺傅东华的说法，见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上海《小晨报》徐北辰《评 海燕》一文，其中说：“自老子被硬请上关，讲学，编讲义，以及得了饽饽等赠品被放行止，一句两句的零碎讽刺很多，但却看不准他究竟在讽刺谁，好像是傅东华，然而也只是好像而已，并没有可下断语的凭据。”傅东华（1893—1971），浙江金华人，翻译家。当时任《文学》月刊主编。

〔5〕施耐庵相传为元末明初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长篇小说《水浒传》的作者。

旧籍中关于他的记述互有出入，都无确证，所以这里说“姑且认为真有这作者罢”。

〔6〕参看本书《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7〕曹雪芹（？—1763或1764）号雪芹，满洲正白旗“包衣”人，清代小说家，《红楼梦》的作者。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8〕《儒林外史》长篇讽刺小说，清代吴敬梓著。书中人物马二先生（马纯上）是个八股文选家。冯执中，应作冯萃中。清代金和在《儒林外史》跋文中说：“马纯上者，冯萃中。”〔9〕胡适在一九二一年所写的《红楼梦考证》中说：“《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10〕老子参看本卷第301页注〔12〕。相传孔丘向他问过礼。后来他西出函谷关而去。现存《老子》一书，分《道经》、《德经》上下两篇，是战国时人编纂的老聃的言论集。

〔11〕邱韵铎上海人，曾任创造社出版部主任。他的《海燕读后记》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二十一期。

〔12〕太炎即章太炎，参看本卷第107页注〔30〕和本书《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注〔2〕。《诸子学略说》是他述评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学说的著作，其中论及老子出关事说：“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

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鹄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原注：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已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偏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五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驾其上者乎？”（见一九〇六年《国粹学报》第二年第四册。）

〔13〕老，是尚柔的《老子》上篇有“柔胜刚，弱胜强”这话。

〔14〕“儒者，柔也”语出许慎《说文解字》卷八。

〔15〕“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语出《论语·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16〕“无为而无不为”语出《老子》上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下篇：“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为之而无以为。”

〔17〕关尹子相传是春秋末函谷关的关尹。235 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作者生前开始编集，后经许广平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一九三六年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1〕凯绥·勒密特（K a e t h e S c h m i d t）以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生于东普鲁士的区匿培克（K o e n i g s b e r g）。她的外祖父是卢柏（J u l i u s R u p p），即那地方的自由宗教协会的创立者。父亲原是候补的法官，但因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见，没有补缺的希望了，这穷困的法学家便如俄国人之所说：“到民间去”〔2〕，做了木匠，一直到卢柏死后，才来当这教区的首领和教师。他有四个孩子，都很用心的加以教育，然而先不知道凯绥的艺术的才能。凯绥先学的是刻铜的手艺，到一八八五年冬，这才赴她的兄弟在研究文学的柏林，向斯滔发·培伦（S t a u f f e r B e r n）〔3〕去学绘画。后回故乡，学于奈台（N e i d e）〔4〕，为了“厌倦”，终于向闵兴的哈台列克（H e r t e r i c h）〔5〕那里去学习了。

一八九一年，和她兄弟的幼年之友卡尔·珂勒惠支（K a r l K o l l w i t z）结婚，他是一个开业的医生，于是凯绥也就在柏林的“小百姓”之间住下，这才放下绘画，刻起版画来。待到孩子们长大了，又用力于雕刻。一八九八年，制成有名的《织工一揆》〔6〕计六幅，取材于一八四四年的史实，是与先出的霍普德曼（G e r h a r t H a u p t m a n n）〔7〕的剧本同名的；一八九九年刻《格莱亲》，零一年刻《断头台边的舞蹈》；零四年旅行巴黎；零四至八年成连续版画《农民战争》七幅，获盛名，受V i

lla - Romana 奖金〔8〕，得游学于意大利。这时她和一个女友由佛罗棱萨步行而入罗马，然而这旅行，据她自己说，对于她的艺术似乎并无大影响。一九〇九年作《失业》，一〇年作《妇人被死亡所捕》和以“死”为题材的小图。

世界大战起，她几乎并无制作。一九一四年十月末，她的很年青的大儿子以义勇兵死于弗兰兑伦（F l a n d e r n）战线上。一八年十一月，被选为普鲁士艺术学院会员，这是以妇女而入选的第一个。从一九年以来，她才仿佛从大梦初醒似的，又从事于版画了，有名的是这一年的纪念里勃克内希（L i e b k n e - c h t）〔9〕的木刻和石刻，零二至零三年〔10〕的木刻连续画《战争》，后来又有三幅《无产者》，也是木刻连续画。一九二七年为她的六十岁纪念，霍普德曼那时还是一个战斗的作家〔11〕，给她书简道：“你的无声的描线，侵人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希腊和罗马时候都没有听到过的呼声。”法国罗曼·罗兰（R o - m a i n R o l l a n d）〔12〕则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褊 E 的同情，罢戾 赵谒 难壑校 拇*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然而她在现在，却不能教授，不能作画，只能真的沉默的和她的儿子住在柏林了；她的儿子像那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医生。

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诚如亚斐那留斯（F e r d i n a n d A v e n a r i u s）〔13〕之所说：“新世纪的前几年，她第一次展览作品的时候，就为报章所喧传的了。从此以来，一个说，‘她是伟大的版画家’；人就过作无聊的不成话道：‘凯绥·珂勒惠支是属于只有一个男子的新派版画家里的’。别一个说：‘她是社会主义的宣传家’，第三个却道：‘她是悲观的困苦的画手’。而第四个又以为‘是一个宗教的艺术家’。要之：无论人们怎样地各以自己的感觉和思想来解释这艺术，怎样地从中只看见一种的意义——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没有忘记她。谁一听到凯绥·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见这艺术。这艺术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但在我们中国，介绍的还不多，我只记得在已经停刊的《现代》和《译文》上，各曾刊印过她的一幅木刻，〔14〕原画自然更少看见；前四五年，上海曾经展览过她的几幅作品，但恐怕也不大有十分注意的人。她的本国所复制的作品，据我所见，以《凯绥·珂勒惠支画帖》（K a e t h e K o l l w i t z M a p p e , H e r a u s g e g e b e n V o n K u n s t w a r t , K u n s t w a r t - V e r l a g , M u e n - c h e n , 1 9 2 7）为最佳，但后一版便变了内容，忧郁的多于战斗的了。印刷未精，而幅数较多的，则有《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D a s K a e t h e K o l l w i t z W e r k , C a r l R e i s n e r V e r l a g , D r e s d e n , 1 9 3 0），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此后又出了一本新集（D a s N e u e K K o l l w i t z W e r k , 1 9 3 3），却更多明朗之作了。霍善斯坦因（W i l h e l m H a u s e n s t e i n）〔15〕批评她中期的作品，以为虽然间有鼓动的男性的版画，暴力的恐吓，

但在根本上，是和颇深的生活相联系，形式也出于颇激的纠葛的，所以那形式，是紧握着世事的形相。永田一修〔16〕并取她的后来之作，以这批评为不足，他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和里培尔曼（Max Liebermann）〔17〕不同，并非只觉得题材有趣，来画下层世界的；她因为被周围的悲惨生活所动，所以非画不可，这是对于榨取人类者的无穷的“愤怒”。“她照目前的感觉，——永田一修说——描写着黑土的大众。她不将样式来范围现象。时而见得悲剧，时而见得英雄化，是不免的。然而无论她怎样阴郁，怎样悲哀，却决不是非革命。她没有忘却变革现实社会的可能。而且愈入老境，就愈脱离了悲剧的，或者英雄的，阴暗的形式。”而且她不但为周围的悲惨生活抗争，对于中国也没有像中国对于她那样的冷淡：一九三一年一月间，六个青年作家遇害〔18〕之后，全世界的进步的文艺家联名提出抗议的时候，她也是署名的一个人。现在，用中国法计算作者的年龄，她已届七十岁了，这一本书的出版，虽然篇幅有限，但也可以算是为她作一个小小的纪念的罢。

选集所取，计二十一幅，以原版拓本为主，并复制一九二七年的印本《画帖》以足之。

以下据亚斐那留斯及第勒（Louise Diel）〔19〕的解说，并略参己见，为目录——（1）《自画像》（Selbstbild）。石刻，制作年代未详，按《作品集》所列次序，当成于一九一〇年顷〔20〕；据原拓本，原大34×30cm这是作者从许多版画的肖像中，自己选给中国的一幅，隐然可见她的悲悯，愤怒和慈和。

（2）《穷苦》（Not）。石刻，原大15×15cm据原版拓本，后五幅同。这是有名的《织工一揆》（Ein Weberaufstand）的第一幅，一八九八年作。前四年，霍普德曼的剧本《织匠》始开演于柏林的德国剧场，取材是一八四四年的勳列济安（Schlesien）〔21〕麻布工人的蜂起，作者也许是受着一点这作品的影响的，但这可以不必深论，因为那是剧本，而这却是图画。我们借此进了一间穷苦的人家，冰冷，破烂，父亲抱一个孩子〔22〕，毫无方法的坐在屋角里，母亲是愁苦的，两手支头，在看垂危的儿子，纺车静静的停在她的旁边。

（3）《死亡》（Tod）。石刻，原大22×18cm同上的第二幅。还是冰冷的房屋，母亲疲劳得睡去了，父亲还是毫无方法的，然而站立着在沉思他的无法。桌上的烛火尚有余光，“死”却已经近来，伸开他骨出的手，抱住了弱小的孩子。孩子的眼睛张得极大，在凝视我们，他要生存，他至死还在希望人有改革运命的力量。

（4）《商议》（Beratung）。石刻，原大27×17cm同上的第三幅。接着前两幅的沉默的忍受和苦恼之后，到这里却现出生存竞争的景象来了。我们只在黑暗中看见一片桌面，一只杯子和两个人，但为的是在商议摔掉被践踏的运命。

（5）《织工队》（Weberzug）。铜刻，原大22×29cm同上的第四幅。队伍进向吮取脂膏的工场，手里捏着极可怜的武器，手脸都瘦损，神情也很颓唐，因为向来总饿着肚子。队伍中有女人，也疲惫到不过走得动；这作者所写的大众里，是大抵有女人的。她还背着孩子，却伏在肩头睡去了。

（6）《突击》（Sturm）。铜刻，原大24×29cm同上的第五

幅。工场的铁门早经锁闭，织工们却想用无力的手和可怜的武器，来破坏这铁门，或者是飞进石子去。女人们在助战，用痉挛的手，从地上挖起石块来。孩子哭了，也许是路上睡着的那一个。这是在六幅之中，人认为最好的一幅，有时用这来证明作者的《织工》，艺术达到怎样的高度的。

(7)《收场》(Ende)。铜刻，原大24×30cm同上的第六和末一幅。我们到底又和织工回到他们的家里来，织机默默的停着，旁边躺着两具尸体，伏着一个女人；而门口还在抬进尸体来。这是四十年代，在德国的织工的求生的结局。

(8)《格莱亲》(Gretchen)。一八九九年作，石刻；据《画帖》，原大未详。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23]有浮士德爱格莱亲，诱与通情，有孕；她在井边，从女友听到邻女被情人所弃，想到自己，于是向圣母供花祷告事。这一幅所写的是这可怜的少女经过极狭的桥上，在水里幻觉的看见自己的将来。她在剧本里，后来是将她和浮士德所生的孩子投在水里淹死，下狱了。原石已破碎。

(9)《断头台边的舞蹈》(Tanz Um Die Guillotine)。一九〇一年作，铜刻；据《画帖》，原大未详。是法国大革命时候的一种情景：断头台造起来了，大家围着它，吼着“让我们来跳加尔玛弱儿舞罢！”(Dansons La Carmagnole!)[24]的歌，在跳舞。不是一个，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同样的可怕了的一群。周围的破屋，像积叠起来的困苦的峭壁，上面只见一块天。狂暴的人堆的臂膊，恰如净罪的火焰一般，照出来的只有一个阴暗。

(10)《耕夫》(Die Pflueger)。原大31×45cm这就是有名的历史的连续画《农民战争》(Bauernkrieg)的第一幅。画共七幅，作于一九〇四至〇八年，都是铜刻。现在据以影印的也都是原拓本。“农民战争”是近代德国最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一，以一五二四年顷，起于南方，其时农民都在奴隶的状态，被虐于贵族的封建的特权；马丁·路德[25]既提倡新教，同时也传播了自由主义的福音，农民就觉醒起来，要求废止领主的苛例，发表宣言，还烧教堂，攻地主，扰动及于全国。然而这时路德却反对了，以为这种破坏的行为，大背人道，应该加以镇压，诸侯们于是放手的讨伐，恣行残酷的复仇，到第二年，农民就都失败了，境遇更加悲惨，所以他们后来就称路德为“撒谎博士”。这里刻划出来的是没有太阳的天空之下，两个耕夫在耕地，大约是弟兄，他们套着绳索，拉着犁头，几乎爬着的前进，像牛马一般，令人仿佛看见他们的流汗，听到他们的喘息。后面还该有一个扶犁的妇女，那恐怕总是他们的母亲了。

(11)《凌辱》(Vergewaltigt)。同上的第二幅，原大35×53cm男人们的受苦还没有激起变乱，但农妇也遭到可耻的凌辱了；她反缚两手，躺着，下颏向天，不见脸。死了，还是昏着呢，我们不知道。只见一路的野草都被蹂躏，显着曾经格斗的样子，较远之处，却站着可爱的小小的葵花。

(12)《磨镰刀》(Beim Dengeln)。同上的第三幅，原大30×30cm这里就出现了饱尝苦楚的女人，她的壮大粗糙的手，在用一块磨石，磨快大镰刀的刀锋，她那小小的两眼里，是充满着极顶的憎恶和愤怒。

(13)《圆洞门里的武装》(Bewaffnung In Einem

Ge - woel be)。同上的第四幅，原大50×33cm大家都在一个阴暗的圆洞门下武装了起来，从狭窄的戈谛克式〔26〕阶级蜂涌而上：是一大群拚死的农民。光线愈高愈少；奇特的半暗，阴森的人相。

(14)《反抗》(Losbruch)。同上的第五幅，原大51×50cm谁都在草地上没命的向前，最先是少年，喝令的却是一个女人，从全体上洋溢着复仇的愤怒。她浑身是力，挥手顿足，不但令人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还好像天上的云，也应声裂成片片。她的姿态，是所有名画中最有力量的女性的一个。也如《织工一揆》里一样，女性总是参加着非常的事变，而且极有力，这也就是“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的精神。

(15)《战场》(Schlachtfeld)。同上的第六幅，原大41×53cm农民们打败了，他们敌不过官兵。剩在战场上的是什么呢？几乎看不清东西。只在隐约看见尸横遍野的黑夜中，有一个妇人，用风灯照出她一只劳作到满是筋节的手，在触动一个死尸的下巴。光线都集中在这一小块上。这，恐怕正是她的儿子，这处所，恐怕正是她先前扶犁的地方，但现在流着的却不是汗而是鲜血了。

(16)《俘虏》(Die Gefangenen)。同上的第七幅，原大33×42cm，画里是被捕的子遗，有赤脚的，有穿木鞋的，都是强有力的汉子，但竟也有儿童，个个反缚两手，禁在绳圈里。他们的运命，是可想而知的了，但各人的神气，有已绝望的，有还是倔强或愤怒的，也有自在沉思的，却不见有什么萎靡或屈服。

(17)《失业》(Arbeitslosigkeit)。一九〇九年作，铜刻；据《画帖》，原大44×54cm他现在闲空了，坐在她的床边，思索着——然而什么法子也想不出。那母亲和睡着的孩子们的模样，很美妙而崇高，为作者的作品中所罕见。

(18)《妇人为死亡所捕获》(Frau Vom Tod Gepackt)，亦名《死和女人》(Tod Und Weib)。一九一〇年作，铜刻；据《画帖》，原大未详。“死”从她本身的阴影中出现，由背后来袭击她，将她缠住，反剪了；剩下弱小的孩子，无法叫回他自己的慈爱的母亲。一转瞬间，对面就是两界。“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而这妇人则是全作品中最伟大的一人。

(19)《母与子》(Mutter Und Kind)。制作年代未详〔27〕，铜刻；据《画帖》，原大19×13cm在《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中所见的百八十二幅中，可指为快乐的不过四五幅，这就是其一。亚斐那留斯以为从特地描写着孩子的呆气的侧脸，用光亮衬托出来之处，颇令人觉得有些忍俊不禁。(20)《面包！》(Brot!)。石刻，制作年代未详〔28〕，想当在欧洲大战之后；据原拓本，原大30×28cm饥饿的孩子的急切的索食，是最碎裂了做母亲的心的。这里是孩子们徒然张着悲哀，而热烈地希望着的眼，母亲却只能弯了无力的腰。她的肩膀耸了起来，是在背人饮泣。她背着人，因为肯帮助的和她一样的无力，而有力的是横竖不肯帮助的。她也不愿意给孩子们看见这是剩在她这里的仅有的慈爱。(21)《德国的孩子们饿着！》(Deutschlands Kinder Hungern!)。石刻，制作年代未详〔29〕，想当在欧洲大战之后；据原拓本，原大43×29cm他们都擎着空碗向人，瘦削的脸上的圆睁的眼睛里，炎炎的燃着如火的热望。谁伸出手来呢？这里无从知道。这原是横幅，一面写着现在作为

标题的一句，大约是当时募捐的揭帖。后来印行的，却只存了图画。作者还有一幅石刻，题为《决不再战！》（Nie Wieder Krieg！），是略早的石刻，可惜不能搜得；而那时的孩子，存留至今的，则已都成了二十以上的青年，可又将被驱作兵火的粮食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鲁迅。

〔1〕本篇最初印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此书由鲁迅编选，一九三六年五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用珂罗版和宣纸印制。

〔2〕〔2〕“到民间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派别“民粹派”的口号。

〔3〕斯滔发·培伦（1857—1891）现译施陶费尔-贝尔恩，瑞士画家。曾在柏林女子绘画学校任教。

〔4〕奈台（Emil Neide）现译埃米尔·奈德，德国画家。作品多以犯罪为题材，据珂勒惠支回忆，其轰动一时的作品是《生之厌倦》。

〔5〕哈台列克现译赫特里希。珂勒惠支曾在慕尼黑（旧译“闵兴”）的赫特里希美术学院（The Hertterich Academy）学习过。

〔6〕《织工一揆》（Ein Weberaufstand）“织工起义”的意思。一揆，日本语。

〔7〕霍普德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他的剧本《织工》（Die Weber）以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题材，出版于一八九二年。

〔8〕Villa-Romana奖金Villa-Romana，意大利文，意为“罗马别墅”。这项奖金的获得者可在意大利居住一年，以熟悉当地艺术宝藏并进行创作。

〔9〕里勃克内希（Karl Liebknecht，1871—1919）通译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革命家、作家。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他领导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起义，于同月十五日被杀害。

〔10〕应为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

〔11〕霍普德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为德国的侵略战争辩护，希特勒执政后，又曾对纳粹主义表示妥协。但他早期的许多作品常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具有社会批判意义。下面所引他的话，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写的印在珂勒惠支画册上的题词。

〔12〕罗曼·罗兰参看本卷第415页注〔4〕。这里所引他的话，是他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写的印在珂勒惠支画册前面的题词，原文为法文。

〔13〕亚斐那留斯（1856—1923）德国艺术批评家、诗人，曾创办《艺术》杂志。这里所引他的话，见于一九二十年出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画帖》。

〔14〕《现代》参看本卷第124页注〔5〕。该刊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刊登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同时，刊出了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刊有她的《被死所袭击的孩子》、《饿》、《战后的寡妇》、《母亲们》等四幅版画。《译文》，参看本卷第492页注〔1〕。该刊终刊号（一九三五年九月）刊有珂勒惠支的木刻《吊丧》。

〔15〕霍善斯坦因（1882—1957）德国文艺批评家。著有《艺术与社会》、《现代的艺术中的社会的要素》等。

〔16〕永田一修日本艺术评论家。这里所引他的话，见《无产阶级艺术论》（一九三〇年出版）。

〔17〕里培尔曼（1847—1935）德国画家，德国印象派的先驱。作品有《罐头工厂女工》、《麻纺工场》等。

〔18〕六个青年作家遇害应为五个青年作家遇害。参看本卷第158页注〔3〕。

〔19〕第勒现译为路易斯·迪尔，德国美术家。

〔20〕应为一九一九年。

〔21〕勔列济安通译西里西亚。一八四四年六月四日，西里西亚的织工反对企业主的残酷剥削，发动起义，不久即遭到镇压而失败。

〔22〕关于《穷苦》，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致日本鹿地亘的信中说：“请将说明之二《穷苦》条下‘父亲抱一个孩子’的‘父亲’改为‘祖母’。我看别的复制品，怎么看也像是女性。Die l的说明中也说是祖母。”

〔23〕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学者。《浮士德》是取材于民间传说的长篇诗剧，描写主人公浮士德为了探求生活的意义，借助魔鬼的力量遍尝人生悲欢的奇特经历。

〔24〕加尔玛弱儿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舞曲。“让我们来跳加尔玛弱儿舞罢”是这首舞曲中的一句歌词。

〔25〕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他最初反对教皇，揭露教会的腐败，同情农民起义，但不久就站到统治阶级一边，和贵族、教皇等结成同盟，镇压农民起义。

〔26〕戈谛克式又译哥特式，十一世纪时创始于法国北部的一种建筑式样，以尖顶的拱门和高耸的尖屋顶为其特色。

〔27〕《母与子》制作于一九一〇年。

〔28〕《面包！》制作于一九二四年。

〔29〕《德国的孩子们饿着！》制作于一九二四年。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记得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的时候，我们曾经非常高兴过，因为我们也是曾被压迫，挣扎出来的人民。捷克的兴起〔2〕，自然为我们所大欢喜；但是奇怪，我们又很疏远，例如我，就没有认识过一个捷克人，看见过一本捷克书，前几年到了上海，才在店铺里目睹了捷克的玻璃器。

我们彼此似乎都不很互相记得。但以现在的一般情况而论，这并不算坏事情，现在各国的彼此念念不忘，恐怕大抵未必是为了交情太好了的缘故。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

出乎意外地，译者竟首先将试尽这任务的光荣，加在我这里了。我的

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鲁迅。

〔1〕本篇是作者应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博士（Dr J Prusek，1907—1980）之请而写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出版的《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曾据作者所有底稿刊出，题作《捷克文译本 短篇小说选集 序》。一九三七年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时，编者据底稿改题为《捷克译本》。现据《呐喊》捷克译本（《Vraua》）书前影印的手迹排印。捷克文译本译者为普实克和弗拉斯塔·诺沃特娜（V Novotná），收《呐喊》中小说八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

〔2〕捷克的兴起捷克和斯洛伐克原先长期受奥匈帝国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宣告独立，联合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译文》复刊词

先来引几句古书，——也许记的不真确，——庄子曰：“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2〕《译文》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出世的。那时候，鸿篇巨制如《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库》〔3〕之类，还没有诞生，所以在这青黄不接之际，大约可以说是仿佛戈壁中的绿洲，几个人偷点余暇，译些短文，彼此看看，倘有读者，也大家看看，自寻一点乐趣，也希望或者有一点益处，——但自然，这决不是江湖之大。

不过这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终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终刊号”和大家告别了。

虽然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气和慰安：这是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对于《译文》的凭吊。

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

我们也不断的希望复刊。但那时风传的关于终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所以荏苒半年，简直死得无药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说这才起了动摇，得到再造的运会，再和大家相见了。

内容仍如创刊时候的《前记》里所说一样：原料没有限制；门类也没有固定；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

这一回，将来的运命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但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

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三月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一期“复刊号”。

《译文》，鲁迅和茅盾发起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创刊于一九三四年九月，最初三期为鲁迅编辑，后由黄源接编，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五年九月出至第十三期停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一九三七年六月出至新三卷第四期停刊。

〔2〕“涸辙之鲋”等语，参看本卷第489页注〔8〕。

〔3〕《世界文学》介绍世界各国文学（包括我国）的双月刊，伍蠡甫编辑，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上海黎明书局发行。《世界文库》，参看本卷第358页注〔3〕。

白莽作《孩儿塔》序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给白莽〔2〕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忘却的纪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3〕，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那一世界里有许许多多的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一期，发

表时题为《白莽遗诗序》。

〔2〕白莽（1909—1931）原名徐祖华，笔名白莽、殷夫、徐白，浙江象山人，共产党员，诗人。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孩儿塔》是他的诗集。

〔3〕徐培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署长。一九三四年间因航空署焚毁，曾被捕入狱。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曾经有过这样的—个时候，喧传有好几位名人—都要译《资本论》，自然依据着原文，但有一位还要参照英，法，日，俄各国的译本。到现在，至少已经满六年，还不见有一章发表，这种事业之难可想了。对于苏联的文学作品，那时也一样的热心，英译的短篇小说集一到上海，恰如一—块羊肉坠入狼群中，立刻撕得—片片，或则化为“飞脚阿息普”，或则化为“飞毛腿奥雪伯”〔2〕；然而到得第二本英译《蔚蓝的城》〔3〕输入的时候，志士们却已经—没有这么起劲，有的还早觉得“伊凡”“彼得”，还不如“—洞”“—八索”〔4〕之有趣了。

然而也有并不—哄而起的人，当时好像落后，但因为也不—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

靖华就是—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着的—个。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四十一》，〔5〕出了《铁流》以及其他单行小册很不少，然而不尚广告，至今无—煊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这固然也因为—时自称“革命作家”的过于吊儿郎当，终使坚实者成为硕果，但其实却大半为了中国的读书界究竟有进步，读者自有—确当的批判，不再受—空心大老的欺骗了。

靖华是—未名社中之—员；未名社—一向设在北京，也是—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但还是遭些—无妄之灾，而且遭得颇可笑。它被—封闭过—次〔6〕，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听说发动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后来没有事，启封了。出盘之后，靖华译的两种小说都积在台静农家，又和“新式炸弹”〔7〕—同被收没，后来虽然证明了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装品的机器，书籍却仍然不—发还，于是这两种书，遂成为天地之间的珍本。

为了我的《呐喊》在天津图书馆被焚毁，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以及未名社的横祸，我那时颇觉得北方官长，办事较南方为森严，元朝分—奴隶为四等〔8〕，置北人于南人之上，实在并非—无故。后来知道梁教授虽居北地，实是南人，以及靖华的小说想在南边出版，也曾被—锢多日〔9〕，就又明白我的—结论其实是不—确的了。这也是所谓“—学—问—无—止—境”罢。

但现在居然已经得到出版的机会，闲话休题，是—当然的。言归正传：则这是合两种译本短篇小说集而成的书，删去两篇，加入三篇，以篇数论，有增无减。所取题材，虽多在二十年前，因此其中不见—水闸建筑，不见—集体

农场，但在苏联，还都是保有生命的作品，从我们中国人看来，也全是亲切有味的文章。至于译者对于原语的学力的充足和译文之可靠，是读书界中早有定论，不待我多说的了。

靖华不厌弃我，希望在出版之际，写几句序言，而我久生大病，体力衰惫，不能为文，以上云云，几同塞责。然而靖华的译文，岂真有待于序，此后亦如先前，将默默的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是无疑的。倒是我得以乘机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鲁迅记于上海且介亭之东南角。

〔1〕本篇最初印入《苏联作家七人集》。《苏联作家七人集》，共收短篇小说十五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2〕“飞脚阿息普”、“飞毛腿奥雪伯”这是苏联卡萨特金作的短篇小说《飞着的奥西普》的两种中译名。这两种中译本都是根据纽约国际出版社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英译苏联短篇小说集《飞着的奥西普》转译的。

〔3〕《蔚蓝的城》英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阿·托尔斯泰等著，一九二九年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有薛绩晖的中译本，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4〕“伊凡”“彼得”俄国常见的人名。“一洞”“八索”，中国麻将牌中的两种牌名。

〔5〕《三姊妹》俄国作家契诃夫作的四幕剧。《白茶》，苏联独幕剧集，收独幕剧五篇，其中的《白茶》系班珂所作。《烟袋》，苏联短篇小说集，收小说十一篇，其中的《烟袋》系爱伦堡所作。《四十一》，即《第四十一》，中篇小说，苏联作家拉甫列涅夫作，后来收入《苏联作家七人集》中。

〔6〕关于未名社的被封，参看本卷第69页注〔7〕。

〔7〕“新式炸弹”一九三二年秋，北平警察当局查抄台静农寓所时，把一件制造化妆品的器具误认为“新式炸弹”，将台拘捕；同时没收了曹靖华译的《烟袋》和《第四十一》的存书。

〔8〕元朝分奴隶为四等元朝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其次为色目人，指蒙古人在侵入中原之前所征服的西域人，包括钦察、唐兀、回回等族；再次为汉人，指在金人治下的北中国的汉族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最后为南人，即南宋遗民。

〔9〕上海现代书局原说要出版曹靖华所译的苏联小说，但又将他的译稿搁置起来，后由鲁迅索回编成《苏联作家七人集》。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鲁迅先生：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想一切问题，也许会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

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晃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

拙译《斯大林传》快要出版，出版后当寄奉一册，此书甚望先生细看一下，对原意和译文，均望批评。敬颂痊安。

懋庸上。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2〕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3〕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也就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

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4〕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5〕，不是我们的办法。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其实，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说过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是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所谓“指导家”格杀了，反而即刻从天外飞来似地加我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首先就使我暂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了，因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暂避无益于人的危险，暂不听他们指挥罢。自然，事实会证明他们到底的真相，我决不愿来断定他们是什么人，但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当，观念的不正确，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对于“文艺家协会”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抗日的作家团体，其中虽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为有了“文艺家协会”，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告成了，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艺家都联为一气。那原因就在“文艺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不看别的，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也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论上，如《文学界》〔6〕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〇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7〕。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

〔8〕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个作者又引例了法国的人民阵线〔9〕，然而我以为这又是作者忘记了国度，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的。另一个作者解释“国防文学”，说“国防文学”必须有正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预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10〕。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韩侍桁，杨邨人〔11〕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12〕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办。

至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13〕，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14〕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

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15〕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

——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16〕，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17〕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

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围·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但这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徐懋庸说我“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更是胡说！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18〕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这里的“大众”，即照一向的“群众”，“民众”的意思解释也可以，何况在现在，当然有“人民大众”这意思呢。我说“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不必像辛人〔19〕先生的“时期性”与“时候性”的说法，我更不赞成人们以各种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如果一定要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让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不可，因为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

最后，我要说到我个人的几件事。徐懋庸说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我就检查我这半年的言行。所谓言者，是发表过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对访问者谈过一些闲天，对医生报告我的病状之类；所谓行者，比较的多一点，印过两本版画，一本杂感〔20〕，译过几章《死魂灵》〔21〕，生过三个月的病，签过一个名〔22〕，此外，也并未到过咸肉庄〔23〕或赌场，并未出席过什么会议。我真不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恶劣倾向。难道因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个说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

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24〕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25〕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26〕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

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27〕发表了O V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O V是胡风，笔录也和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28〕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29〕。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狱中，死活不知么？这两个青年就是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过堂皇的悔过的文章，也没有像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30〕。同时，我也看人：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31〕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32〕。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33〕，也要巴金负责？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黄源未尝作文捧我，也没有给我做过传，不过专办着一种月刊，颇为尽责，舆论倒还不坏，怎么便是“谄”，怎么便是对于我的“效忠致敬”？难道《译文》是我的私产吗？黄源“奔走于傅郑〔34〕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了的，

但我不知道，也没有见过，至于他和我的往还，却不见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来断定和谄佞于傅郑门下者“无异”？当这时会，我也就是证人，而并未实见的徐懋庸，对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吗？“和全世界都一样”的吗？那么，可真要吓死人！

其实“现在的基本政策”是决不会这样的好像天罗地网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战友吗？“诈”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灭胡风的文字，打倒黄源的《译文》呢，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35〕和“文化侵略”吗？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自然，战线是会成立的，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覆车之鬼，至死不悟，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

在左联〔36〕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噉噉嚙嚙，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识，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就是《死魂灵》，当《译文》停刊后，《世界文库》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报却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或鲁迅一怒中止了翻译。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噉噉嚙嚙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但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不过也已经糊涂得可观。（否则，便是骄横了。）例如他信里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们的盾牌，……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是从修身上来打击胡风的诈，黄源的谄，还是从作文上来打击胡风的论文，黄源的《译文》呢？——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认识他们，“打击”就“感到绝大的困难”？对于造谣生事，我固然决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们义正词严，我能替他们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吗？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我真要祝祷“国防文学”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许又是我近半年来，“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罪恶了。临末，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大林传》〔37〕。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八月三——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搞，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一九三五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2〕徐懋庸参看本卷第293页注〔1〕。

〔3〕巴金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等。黄源，浙江海盐人，翻译家。曾任《文学》月刊编辑、《译文》月刊编辑。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

〔4〕“文艺家协会”全名“中国文艺家协会”。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于上海。该会的宣言发表于《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5〕“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是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共卖国政策。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

〔6〕《文学界》月刊，周渊编辑，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这里所说“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和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

〔7〕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和“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两段话。

〔8〕鸳鸯蝴蝶参看本卷第419页注〔9〕。

〔9〕法国的人民阵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形成的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三五年正式成立，参加者为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按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未引例法国的人民阵线。该文只是说：“这里，我们可以举行国外的例证。如去年六月举行的巴黎保卫文化大会，在那到会的代表二十多国，人数多至二百七八十人的作家和学者之中，固然有进步的作家和评论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马洛、罗曼罗兰、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诺夫等等，可是同时也包含了福斯脱、

赫胥黎、以及耿飚脱这些比较落后的作家。”

〔10〕指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11〕杜衡参看本卷第4页注〔4〕。杨邨人，参看本卷第149页注〔9〕；韩侍桁，天津人。他们都鼓吹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杜衡的主张相呼应。

〔12〕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国防·污池·炼狱》：“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并不是……一定要声声爱国，一定要句句救亡，然后才是‘国防文艺’……我也相信，‘国防文艺’可以称为广义的爱国文艺。”

〔13〕徐懋庸的话见于他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关于现阶段的中国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文学，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倾向，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且已经为大众所认识，所拥护。但在胡风先生的论文里，对于这个口号……不予批评而另提关于同一运动的新口号，……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呢？”

〔14〕“白衣秀士”王伦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见该书第十九回。

〔15〕即收入本书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16〕胡风的这篇文章，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于《文学丛报》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其中提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

〔17〕茅盾沈雁冰的笔名，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子夜》、《蚀》等。

〔18〕聂绀弩参看本卷第25页注〔2〕。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的《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一文中说：“无疑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阶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说：‘会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只要作家不是为某一个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效力的，只要他不是用封建的，色情的东西来麻醉大众减低大众底趣味的，都可以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之下联合起来。”

〔19〕辛人即陈辛仁，广东普宁人。当时是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在《现实文学》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发表的《论当前文学运动底诸问题》一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是有提倡底必要的，然而，它应该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主要的一部分，它不能包括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内容。以国防文学这口号来否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和用后者来否定前者同样地不充分的。国防文学这口号底时候性不能代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底时期性，同样地，在时期性中也应有时候性底存在……在一个时期性的口号下，应该提出有时候性的具体口号，以适应和引导各种程度上的要求；因为后者常常是作为容易感染普通人民的口号的缘故。”

〔20〕两本版画指作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翻印的《死魂灵百图》和七月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都由作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一本杂感，指《花边文学》，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21〕《死魂灵》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这里说的“译过几章”，指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续译的该书第二部残稿三章。

〔22〕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的签名。这个宣言曾刊载于《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和《文学丛报》第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23〕咸肉庄上海话，一种变相的妓院。

〔24〕指沈端先（夏衍）。

〔25〕田汉参看本卷第214页注〔9〕。周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还有另两个，指沈端先和阳翰笙。

〔26〕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被捕。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大晚报》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

〔27〕《现实文学》月刊，尹庚、白曙编辑，一九三六年七月在上海创刊。第三期改名《人民文学》，后即停刊。该刊第一期发表了O V（冯雪峰）笔录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二文。

〔28〕周文（1907—1952）又名何谷天，四川荣经人，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他的短篇小说《山坡上》在《文学》第五卷第六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时，曾被该刊编者傅东华删改；因而他在同刊第六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给编者的信表示抗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社会日报》发表了署名黑二的《文学起内哄》一文，其中说：“周文是个笔名，原来就是何谷天，是一位七、八成新的作家。他后面，论‘牌头’有周鲁迅，讲‘理论’有左翼社会主义的第三种人的民族文学理论家‘胡风、谷非、张光仁’。”

〔29〕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社会日报》刊登虹儿的《鲁迅将转变？谷非、张光人近况如何？》一文，其中说：“刻遇某文坛要人，据谓鲁迅翁有被转变的消息。……关于鲁迅翁的往哪里去，只要看一看引进员谷非、张光人、胡丰先生的行动就行了。”

〔30〕田汉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捕，同年八月经保释出狱后，曾在南京主持“中国舞台协会”，演出他所编的《回春之曲》、《洪水》、《械斗》等剧。以后接受了党组织的批评，中止了这一活动。

〔31〕“安那其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安那其，法语Anarchisme的音译。

〔32〕战斗的宣言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33〕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一九三六年二月，由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等组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西班牙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同年七月，以佛朗哥为首的右派势力在德、意两国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一九三九年联合政府被推翻。当时参加人民阵线的无政府主义工团派在内部制造分裂，对革命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34〕傅郑指傅东华和郑振铎。参看本卷第348页注〔4〕第5

22页注〔4〕。他们二人曾同为《文学》月刊的主编。

〔35〕“二十一条”指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当时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

〔36〕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〇年三月在上海成立。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丁玲、周扬等。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

〔37〕《斯大林传》法国巴比塞著，中译本改以原著副题《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为书名，徐懋庸译，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海大陆书社出版。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2〕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诂书》〔3〕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4〕和作邹容〔5〕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6〕。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7〕，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餽。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8〕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彪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9〕。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10〕，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11〕斗争，和“××”的×××斗争〔12〕，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13〕，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14〕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见《民报》第六本)[15]，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16]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17]，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18]，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19]，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侔，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20]，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21]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镞。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22]，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裘，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纂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23]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1]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一《二三事》一书。

[2] 太炎章炳麟(1869—1936)，又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氏丛书》(共三编)。

[3] 《馗书》参看本卷第193页注[21]。

[4] 康有为参看本卷第43页注[11]。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组织保皇会，后来并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这里所说“驳斥康有为”，指章太炎发表于一九〇三年五月《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它批驳了康有为主张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与南北美洲诸华裔书》。

[5]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一九〇二年留学日本，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一九〇三年回国，于五月出版鼓吹反清的《革命军》一书，书前有章太炎序。同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拘捕，次年三月判处监禁二年，一九〇五年四月死于租界狱中。

[6] 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苏报》案”。《苏报》，一八九六年创刊于上海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日报。因它曾刊文介绍《革命军》一书，经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于一九〇三年六月和七月先后将章炳麟、邹容等人逮捕。次年三月由上海县知县会同会审公廨审讯，宣布他们的罪状为：“章炳麟作《馗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

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邹容被判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

〔7〕《浙江潮》月刊，清末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一九〇三年二月）创刊于东京。这里的两首诗发表于该刊第七期（一九〇三年九月）。

〔8〕沈禹希（1872—1903）名荇，字禹希，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维新运动的参加者，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一九〇〇年回国，秘密进行反清活动。一九〇三年被捕，杖死狱中。章太炎所作《祭沈禹希文》，载《浙江潮》第九期（一九〇三年十一月）。

〔9〕《民报》月刊，同盟会的机关杂志。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出至第二十四号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九一〇年初又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自一九〇六年九月第七号起直至停刊，都由章太炎主编。

〔10〕“俱分进化”章太炎曾在《民报》第七号（一九〇六年九月）发表谈佛法的《俱分进化论》一文，其中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

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

〔11〕梁启超参看本卷第319页注〔6〕。他逃亡日本后，于一九〇二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章太炎主编的《民报》曾对这种主张予以批驳。

〔12〕和“××”的×××斗争“××”疑为“献策”二字，×××指吴稚晖。吴稚晖（名敬恒）曾参加《苏报》工作，在《苏报》案中有叛卖行为。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九号（一九〇八年二月）发表的《复吴敬恒书》中说：“案仆入狱数日，足下来视，自述见俞明震（按当时为江苏候补道）屈膝请安及赐面事，又述俞明震语，谓‘奉上官条教，来捕足下，但吾辈办事不可野蛮，有释足下意，愿足下善为谋。’时慰丹在傍，问曰：‘何以有我与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黄，嚅嚅不语……足下献策事，则rrr言之。……仆参以足下之屈膝请安S腴盼康び银 嫔 嗽啤 幸灾谣r之言实也。”后来又在《民报》第二十二号（一九〇八年七月）的《再复吴敬恒书》中说：“今告足下，rrr*艘荒挥眩 八昀创撒卫 肫拖嗟 灯渲隆 闾录燃 震，而火票未发以前，未有一言见告；非表里为奸，岂有坐视同党之危而不先警报者？及巡捕抵门，他人犹未知明震与美领事磋商事状，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与明震通情之的证乎？非足下献策之的证乎？”

〔13〕×××指蓝公武。章太炎在《民报》第十号（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发表的《与人书》中说：“某某足下：顷者友人以大著见示，中有《俱分进化论批评》一篇。足下尚崇拜苏轼《赤壁赋》，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所见如此，仆岂必与足下辨乎？”书末又有附白：“再贵报《新教育学冠言》有一语云：‘虽如汗牛之充栋’，思之累日不解。”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有蓝公武《“汗牛之充栋”不是一件可笑的事》一文，说：“当日和太炎辨难的是我，所辩论的题目，是哲学上一个善恶的问题。”按蓝公武（1887—1957），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时事新报》总编辑等职。又章太炎函中所说的“贵报”，指当时蓝公武与张东荪主办的在日本发行的《教育杂志》。

〔14〕一九〇八年作者在东京时曾在章太炎处听讲小学。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中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

〔15〕章太炎这几句话，见《民报》第六号（一九〇六年八月）所载他的《演说录》：“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坡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16〕袁世凯参看本卷第128页注〔3〕。

〔17〕《中华民国解》发表于《民报》第十五号（一九〇七年七月），后来收入《太炎文录·别录》卷一。

〔18〕投壶参看本卷第321页注〔22〕。一九二六年八月间，章太炎在南京任孙传芳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孙传芳曾邀他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

〔19〕七被追捕，三入牢狱章太炎在一九〇六年五月出狱后，东渡日本，在旅日的革命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说：“算来自戊戌年（1898）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载《民报》第六号）至于“三入牢狱”，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可考者为两次：一九〇三年五月因《苏报》案被捕，监禁三年，期满获释；一九一三年八月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袁死后始得自由。

〔20〕“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语出《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21〕“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语见韩愈诗《调张籍》。

〔22〕《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木刻本于一九一九年刊行，共收著作十三种。其中无“诗录”，诗即附于“文录”卷二之末。下文的《章氏丛书续编》，由章太炎的学生吴承仕、钱玄同编校，一九三三年刊行，共收著作七种。

〔23〕《同门录》即同学姓名录。据《汉书·孟喜传》唐代颜师古注：“同门，同师学者也。”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我记得曾有一个时候，我们很少能够从本国的刊物上，知道一点苏联的情形。虽是文艺罢，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样，不但决不沾手，离得还远呢，却已经皱起了鼻子。近一两年可不同了，自然间或还看见几幅从外国刊物上取来的讽刺画，但更多的是真心的介绍着建设的成绩，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着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了口气了。这些介绍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

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平和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2〕的必说真话的人们。

但那些介绍，都是文章或照相，今年的版画展览会，却将艺术直接陈列在我们眼前了。

作者之中，很有几个是由于作品的复制，姓名已为我们所熟识的，但现在才看到手制的原作，使我们更加觉得亲密。

版画之中，木刻是中国早已发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从新兴起的〔3〕是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不久，就遭压迫，又缺师资，所以至今不见有特别的进步。我们在这会里才得了极好，极多的模范。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内战时期，就改革木刻，从此不断的前进的巨匠法复尔斯基（V F a v o r s - k y）〔4〕，和他的一派兑内加（A D e i n e k a）〔5〕，冈察洛夫（A G o n c h a r o v）〔6〕，叶卡斯托夫（G E c h e i s t o v）〔7〕，毕珂夫（M P i k o v）等，他们在作品里各各表现着真挚的精神，继起者怎样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使我们知道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而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

兑内加和叶卡斯托夫的作品，是中国未曾介绍过的，可惜这里也很少；和法复尔斯基接近的保夫理诺夫（P P a v l i n o v）的木刻，我们只见过一幅，现在却弥补了这缺憾了。

克拉甫兼珂（A K r a v c h e n k o）〔8〕的木刻能够幸而寄到中国，翻印介绍了的也只是一幅，到现在大家才看见他更多的原作。他的浪漫的色彩，会鼓动我们的青年的热情，而注意于背景和细致的表现，也将使观者得到裨益。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竟尚高简，变成空虚，这弊病还常见于现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里，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泊尔建造》（D n e p r o s t - r o y），是惊起这种懒惰的空想的警钟。至于毕斯凯莱夫（N P i s k a r e v），则恐怕是最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木刻家。他的四幅《铁流》〔9〕的插画，早为许多青年读者所欣赏，现在才又见了《安娜·加里尼娜》〔10〕的插画，——他的刻法的别一端。

这里又有密德罗辛（D M i t r o k h i n），希仁斯基（L K h i z - h i n s k y），莫察罗夫（S M o c h a l o v）〔11〕，都曾为中国豫先所知道，以及许多第一次看见的艺术家，是从十月革命前已经有名，以至生于二十世纪初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向我们说明通力合作，进向平和的建设的道路。别的作者和作品，展览会的说明书上各有简要说明，而且临末还揭出了全体的要点：“一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对于现实主义的根本的努力”，在这里也无须我赘说了。

但我们还有应当注意的，是其中有乌克兰，乔其亚〔12〕，白俄罗斯的艺术家的作品，我想，倘没有十月革命，这些作品是不但不能和我们见面，也未必会得出现的。

现在，二百余幅的作品，是已经灿烂的一同出现于上海了。单就版画而论，使我们看起来，它不像法国木刻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木刻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

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

附记：会中的版画，计有五种。一木刻，一胶刻（目录译作“油布刻”，颇怪），看名目自明。两种是用强水浸蚀铜版和石版而成的，译作“铜刻”和“石刻”固可，或如目录，译作“蚀刻”和“石印”亦无不可。还有一种 Monotype，是在版上作画，再用纸印，所以虽是版画，却只一幅的东西，我想只好译作“独幅版画”。会中的说明书上译作“摩诺”，还不过等于不译，有时译为“单型学”，却未免比不译更难懂了。其实，那不提撰人的说明，是非常简而得要的，可惜译得很费解，如果有人改译一遍，即使在闭会之后，对于留心版画的人也还是很有用处的。

二月十七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申报》。苏联版画展览会，由当时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和中国文艺社联合主办，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起在上海举行，为期一周。

〔2〕“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语出《孟子·滕文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3〕关于中国现代木刻的兴起，参看《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 小引》。

〔4〕法复尔斯基苏联木刻家。参看《集外集拾遗·引玉集 后记》。

〔5〕兑内加（A AFJMjJL[，1899—？）现译捷依涅卡，苏了驶 婁 暗睿*家。

〔6〕冈察洛夫（A]GjZ[\G,, 1903—？）苏联书籍插画艺术家玻貳场丿犊丅*托夫（]mZJMHIG）现译叶契依斯托夫，生平不详。

〔8〕克拉甫兼珂（A ^q\[ZJjLG 1889—1940* 樟D 究碳摇

〔9〕《铁流》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著的长篇小说。毕斯凯莱夫（1892—1959）为《铁流》所作的四幅插图，曾经鲁迅推荐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文学》月刊创刊号。

〔10〕《安娜·加里尼娜》通译《安娜·卡列尼娜》，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著的长篇小说。

〔11〕密德罗辛、希仁斯基、莫察罗夫都是苏联木刻家。参看《集外集拾遗·引玉集 后记》。

〔12〕乔其亚现译为格鲁吉亚。

三月的租界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2〕，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3〕。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4〕先生的文章为证——“《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5〕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6〕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四月十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 〔3〕田军参看本卷第288页注〔1〕。《大连丸上》，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当时大连是日本的租借地。
- 〔3〕《八月的乡村》田军著的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鲁迅曾为之作序，并将它编入《奴隶丛书》，一九三五年八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 〔4〕狄克张春桥的化名。张春桥，山东巨野人。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七十年代是“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攻击《八月的乡村》和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
- 〔5〕高尔基出生于木工家庭，早年曾当过学徒、码头工人等。
- 〔6〕吉须（E E K i s c h，1885—1948）也译作基希，捷克报告文学家。用德文写作。希特勒统治时期因反对纳粹政权而逃亡国外。
- “九一八”事变后曾来过我国，著有《秘密的中国》等。

我要骗人

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而且还得有清水。浅间山〔2〕边，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罢，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个水兵，在闸北被暗杀了。〔3〕忽然有了许多搬家的人，汽车租钱之类，都贵了好几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国人，外国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马路旁边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里，非常之冷静，再没有卖食物的小商人了，只听得有时从远处传来着犬吠。然而过了两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殴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车夫和洋车夫，日本的报章〔4〕，中国的报章，都异口同声的对于搬了家的人们给了一个“愚民”的徽号。这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天下太平的，只因为有这样的“愚民”，所以把颇好的天下，弄得乱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终没有动，并未加入“愚民”这一伙里。但这并非为了聪明，却只因为懒惰。

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战争〔5〕——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欢称为“事变”似的——的火线下，而且自由早被剥夺〔6〕，夺了我的自由的权力者，又拿着这飞上空中了，所以无论跑到那里去，都是一个样。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但后来的事实，却大抵证明了这断语的的确。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没有

搬家，也并不是因为怀着天下太平的确信，说到底，仍不过为了无论那里都一样的危险的缘故。五年以前翻阅报章，看见过所记的孩子的死尸的数目之多，和从不见有记着交换俘虏的事，至今想起来，也还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殴打车夫，还是极小的事情。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现在单是这模样就完事，总算好得很。

但当大家正在搬家的时候，我也没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热闹，或者坐在家读世界文学史之类的心思。走远一点，到电影院里散闷去。一到那里，可真是天下太平了。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处所〔7〕。我刚要跨进大门，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款，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她一块钱。她这回是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还写给我一张收条。只要拿着这收条，就无论到那里，都没有再出捐款的必要。于是我，就是所谓“好人”，也轻松的走进里面了。

看了什么电影呢？现在已经丝毫也记不起。总之，大约不外乎一个英国人，为着祖国，征服了印度的残酷的酋长，或者一个美国人，到亚非利加去，发了大财，和绝世的美人结婚之类罢。这样的消遣了一些时光，傍晚回家，又走进了静悄悄的环境。听到远地里的犬吠声。女孩子的满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现，自己觉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

诚然，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的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

但我又知道，中国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机关，每年从人民收着税钱，在办事。但反而出了这样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个团体演了戏来筹钱，因为后来只有二十几元，衙门就发怒不肯要。连被水灾所害的难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处来，说是有害治安，就用机关枪去扫射的话也都听到过。恐怕早已统统死掉了罢。然而孩子们不知道，还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费，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

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罢。

然而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为孩子和老人不同，骗她是不应该似的，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时候已是夜里十二点钟。到门外去看了一下。

已经连人影子也看不见。只在一家檐下，有一个卖馄饨的，在和两个警察谈闲天。这是一个平时不大看见的特别穷苦的肩贩，存着的材料多得很，可见他并无生意。用两角钱买了两碗，和我的女人两个人分吃了。算是给他赚一点钱。庄子曾经说过：“干下去的（曾经积水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然而他又说，“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互相忘却的好。”〔8〕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骗

起人来了。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业，又未中止之际，遇到山本社长〔9〕了。因为要我写一点什么，就在礼仪上，答道“可以的”。因为说过“可以”，就应该写出来，不要使他失望，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10〕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地时光。

单是自己一个人的过虑也说不定：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倘能用了笔，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谓眼泪洗明了眼睛那样的便当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这样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这是可以悲哀的。一面写着漫无条理的文章，一面又觉得对不起热心的读者了。

临末，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豫感，算是一个答礼罢。二月二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原稿为日文，后由作者译成中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文学丛报》月刊第三期。

在《改造》发表时，第四段中“上海”、“死尸”、“俘虏”等词及第十五段中“太阳的圆圈”一语，都被删去。《文学丛报》发表时经作者补入，该刊编者在《编后》中曾有说明。

〔2〕浅间山日本的火山，过去常有人去投火山口自杀；它也是游览地区，山下设有旅馆等。

〔3〕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晚日本水兵中山秀雄在上海寰乐安路被暗杀。当时日本侵略者曾借此进行威胁要挟。

〔4〕日本的报章指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日文报纸。

〔5〕上海战争指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战争。当时作者的住所临近战区。

〔6〕自由早被剥夺指作者被通缉的事。一九三〇年二月作者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

〔7〕指当时上海的“租界”地区。

〔8〕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后人所编的《庄子》三十三篇，其中《大宗师》和《天运》篇中都有这样的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天运》篇作“不若”）相忘于江湖。”“涸辙之鲋”，另见《庄子·外物》篇。

〔9〕山本社长山本实彦（1885—1952），当时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

〔10〕太阳的圆圈指日本的国旗。

写于深夜里

一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也有几个人懂得这意义。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北斗》〔2〕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是珂勒惠支教授（Prof Kaethe Kollwitz）的木刻连续画《战争》的第一幅，题目叫作《牺牲》；也是她的版画介绍进中国来的第一幅。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3〕遇害的纪念。他是我的学生和朋友，一同介绍外国文艺的人，尤喜欢木刻，曾经编印过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4〕，虽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龙华和别的五个青年作家〔5〕同时枪毙。当时的报章上毫无记载，大约是不敢，也不能记载，然而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然而，后来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觉得所含的意义的，不过他们大抵以为纪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这时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集正在由欧洲走向中国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恳的介绍者却早已睡在土里了，我们连地点也不知道。好的，我一个人来看。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自然也有挣扎和争斗，但比较的少；这正如作者的自画像，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相同。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6〕的母亲的心心的图像。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说做母亲的只爱不中用的儿子。但我想，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

现在就有她的作品的复印二十一幅，来作证明；并且对于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又有这样的益处的——一，近五年来，木刻已颇流行了，虽然时时受着迫害。但别的版画，较成片段的，却只有一本关于卓伦（Anders Zorn）〔7〕的书。现在所介绍的全是铜刻和石刻，使读者知道版画之中，又有这样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画之类更加普遍，而且看见和卓伦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内容。

二，没有到过外国的人，往往以为白种人都是对人来讲耶稣道理或开洋行的，鲜衣美食，一不高兴就用皮鞋向人乱踢。有了这画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气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

三，现在中国的报纸上多喜欢登载张口大叫着的希特拉〔8〕像，当时是暂时的，照相上却永久是这姿势，多看就令人觉得疲劳。现在由德国艺术家的画集，却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后的满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后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国式计算起来，她是七十岁了，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纪念。作者虽然现在也只能守着沉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远东的天

下出现了。是的，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

二略论暗暗的死这几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

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喝一声采，后来还传述开去。在我年青的时候，常听到这种事，我总以为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

新近在林语堂〔9〕博士编辑的《宇宙风》里，看到一篇铄堂〔10〕先生的文章，却是别一种见解。他认为这种对死囚喝采，是崇拜失败的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来成功的帝王，欲维持几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残害几万几十万无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时的慑服”。

残害了几万几十万人，还只“能博得一时的慑服”，为“成功的帝王”设想，实在是大可悲哀的：没有好法子。不过我并不想替他们划策，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给死囚在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给他在临死之前，得到一个自夸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不是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调笑。到得就要失败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财产的数目和安放处所；再下去，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杀人。这时他也如铄堂先生一样，觉得民众自有好恶，不论成败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种秘密法，是即使没有策士的献议，也总有一时要采用的，也许有些地方还已经采用。这时街道文明了，民众安静了，但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我先前读但丁〔11〕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三一个童话看到二月十七日的《D Z Z》〔12〕，有为纪念海涅（H Hei - ne）〔13〕死后八十年，勃莱兑勒（Willi Bredel）〔14〕所作的《一个童话》，很爱这个题目，也来写一篇。

有一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国度。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倒都是强敌了，拼音字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取得了土地，但规定的车站上不能下车。地面上也不能走了，总得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皮肤的抵抗力也衰弱起来，一有紧要的事情，就伤风，同时还传染给大臣们，一齐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还不止一部，然而都是都不合于实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例如：“解放”就是“枪毙”；“托尔斯泰主义”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为防学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坚固的砖墙”；“道德”条下注云：“不准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条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里，用飞机载炸弹向‘匪贼’头上掷之也。”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

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有一天的早晨，许多军警围住了一个美术学校〔15〕。校里有几个中装和西装的人在跳着，翻着，寻找着，跟随他们的也是警察，一律拿着手枪。不多久，一位西装朋友就在寄宿舍里抓住了一个十八岁的学生的肩头。

“现在政府派我们到你们这里来检查，请你……”“你查罢！”那青年立刻从床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条箱来。

这里的青年是积多年的经验，已颇聪明了的，什么也不敢有。但那学生究竟只有十八岁，终于被在抽屉里，搜出几封信来了，也许是因为那些信里面说到他的母亲的困苦而死，一时不忍烧掉罢。西装朋友便子子细细的一字一字的读着，当读到“……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你的母亲被吃去了，天下无数无数的母亲也会被吃去的……”的时候，就把眉头一扬，摸出一枝铅笔来，在那些字上打着曲线，问道：“这是怎么讲的？”“……”“谁吃你的母亲？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吗？我们吃你的母亲？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为枪弹，打了过去的样子。

“那里！……这……那里！……这……”青年发急了。

但他并不把眼珠射出去，只将信一折，塞在衣袋里；又把那学生的木版，木刻刀和拓片，《铁流》，《静静的顿河》〔16〕，剪贴的报，都放在一处，对一个警察说：“我把这些交给你！”“这些东西里有什么呢，你拿去？”青年知道这并不是好事情。

但西装朋友只向他瞥了一眼，立刻顺手一指，对别一个警察命令道：“我把这个交给你！”警察的一跳好像老虎，一把抓住了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寄宿舍的大门口去了。

门外还有两个年纪相仿的学生〔17〕，背脊上都有一只勇壮巨大的手在抓着。旁边围着一大层教员和学生。

四又是一个童话有一天的早晨的二十一天之后，拘留所里开审了。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上面坐着两位老爷，一东一西。东边的一个是马褂，西边的一个是西装，不相信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的乐天派，录口供的。警察吆喝着连抓带拖的弄进一个十八岁的学生来，苍白脸，脏衣服，站在下面。马褂问过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之后，就又问道：“你是木刻研究会〔18〕的会员么？”“是的。”“谁是会长呢？”“C h……正的，H……副的。”“他们现在在那里？”“他们都被学校开除了，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鼓动风潮呢，在学校里？”“阿！……”青年只惊叫了一声。

“哼。”马褂随手拿出一张木刻的肖像来给他看，“这是你刻的吗？”“是的。”“刻的是谁呢？”“是一个文学家。”“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卢那却尔斯基〔19〕。”“他是文学家？——他是那一国人？”“我不知道！”这青年想逃命，说谎了。

“不知道？你不要骗我！这不是露西亚〔20〕人吗？这不是明明白白

的露西亚红军军官吗？我在露西亚的革命史上亲眼看见他的照片的呀！你还想赖？”“那里！”青年好像头上受到了铁椎的一击，绝望的叫了一声。

“这是应该的，你是普罗艺术家，刻起来自然要刻红军军官呀！”“那里……这完全不是……”“不要强辩了，你总是‘执迷不悟’！我们很知道你在拘留所里的生活很苦。但你得从实说来，好使我们早些把你送给法院判决。——监狱里的生活比这里好得多。”青年不说话——他十分明白了说和不说一样。

“你说，”马褂又冷笑了一声，“你是C P，还是C Y〔21〕？”“都不是的。这些我什么也不懂！”“红军军官会刻，C P，C Y就不懂了？人这么小，却这样的刁顽！去！”于是一只手顺势向前一摆，一个警察很聪明而熟练的提着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写到这里，似乎有些不像童话了。但如果不称它为童话，我将称它为什么呢？特别的只在我说得出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五一封真实的信“敬爱的先生：你问我出了拘留所以后的事情么，我现在大略叙述在下面——在当年的最后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三个被××省〔22〕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开检查庭。这检察官的审问很特别，只问了三句：‘你叫什么名字？’——第一句；‘今年你几岁？’——第二句；‘你是那里人？’——第三句。

开完了这样特别的庭，我们又被法院解到了军人监狱。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惨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拉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于危急的时候〔23〕，曾在三刻钟之内，打死了二十二个；福建人民政府〔24〕成立时，也枪毙了不少。刑场就是狱里的五亩大的菜园，囚犯的尸体，就靠泥埋在菜园里，上面栽起菜来，当作肥料用。

约莫隔了两个半月的样子，起诉书来了。法官只问我们三句话，怎么可以做起诉书的呢？可以的！原文虽然不在手头，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条目已经忘记了——‘……C h……H……所组织之木刻研究会，系受共党指挥，研究普罗艺术之团体也。被告等皆为该会会员，……核其所刻，·皆·为红军军官及劳动饥饿者之景象，·借·以鼓动阶级斗争而·示无产阶级必有专政之一日。……’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审判庭。庭上一字儿坐着老爷五位，威严得很。然而我倒并不怎样的手足无措，因为这时我的脑子里浮出了一幅图画，那是陀密埃（Honoré Daumier）的《法官》〔25〕，真使我赞叹！

审判庭开后的第八日，开最后的判决庭，宣判了。判决书上所开的罪状，也还是起诉书上的那么几句，只在它的后半段里，有——‘核其所为，当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条，刑法第×百×十×条第×款，各处有期徒刑五年。……然被告等皆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不无可悯，特依××法第×千×百×十×条第×款之规定，减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于判决书送到后十日以内，不服上诉……’云云。

我还用得到‘上诉’么？‘服’得很！反正这是他们的法律！

总结起来，我从被捕到放出，竟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现在，我除了感激他们不砍我的头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的不知几多的知识。单在刑罚一方面，我才晓得现在的中国有：一，抽藤条，二，老虎凳，都还是轻的；三，踏杠，是叫犯人跪下，把铁杠放在他的腿弯上，两头站上彪形大

汉去，起先两个，逐渐加到八人；四，跪火链，是把烧红的铁链盘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还有一种叫‘吃’的，是从鼻孔里灌辣椒水，火油，醋，烧酒……；六，还有反绑着犯人的手，另用细麻绳缚住他的两个大拇指，高悬起来，吊着打，我叫不出这刑罚的名目。

我认为最惨的还是在拘留所里和我同枕的一个年青的农民。老爷硬说他是红军军长，但他死不承认。呵，来了，他们用缝衣针插在他的指甲缝里，用榔头敲进去。敲进去了一只，不承认，敲第二只，仍不承认，又敲第三只……第四只……终于十只指头都敲满了。直到现在，那青年的惨白的脸，凹下的眼睛，两只满是鲜血的手，还时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难于忘却！使我苦痛！……然而，入狱的原因，直到我出来之后才查明白。祸根是在我们学生对于学校有不满之处，尤其是对于训育主任，而他却是省党部的政治情报员。他为了要镇压全体学生的不满，就把仅存的三个木刻研究会会员，抓了去做示威的牺牲了。而那个硬派卢那却尔斯基为红军军官的马褂老爷，又是他的姐夫，多么便利呵！

写完了大略，抬头看看窗外，一地惨白的月色，心里不禁渐渐地冰凉了起来。然而我自信自己还并不怎样的怯弱，然而，我的心冰凉起来了……愿你的身体康健！

人凡〔26〕。四月四日，后半夜。”（附记：从《一个童话》后半起至篇末止，均据人凡君信及《坐牢略记》。四月七日。）〔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此文是为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而作，英译稿发表于同年六月一日该刊第一卷第六期。作者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致曹白信中说：“为了一张文学家的肖像，得了这样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话，我想作一点短文，到外国去发表。所以希望你告诉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二年四月？），但只要一点大略就够。”又在五月四日信中说：“你的那篇文章（按指《坐牢略记》），尚找不着适当的发表之处。我只抄了一段，连一封信（略有删去及改易），收在《写在深夜里》的里面。”

〔2〕《北斗》文艺月刊。“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丁玲主编。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创刊，次年七月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后因国民党政府压迫停刊，共出八期。

〔3〕柔石（1902—1931）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共产党员，作家。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等创办朝花社。著有中篇小说《二月》、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

〔4〕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指印入《艺苑朝华》的《近代木刻选集》第一、二两集和《比亚兹莱画选》。

〔5〕五个青年作家应为“四个青年作家”。参看本卷第158页注〔3〕。

〔6〕“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原是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作的长篇小说的书名，这里借用它字面的意思。

〔7〕卓伦（1860—1920）瑞典画家、雕刻家和铜版蚀刻画家。

〔8〕希特拉参看本卷第14页注〔10〕。

〔9〕林语堂参看本卷第203页注〔4〕。《宇宙风》，参看本卷第4

36页注〔9〕。

〔10〕铢堂原作铢庵，本名瞿宣颖（1894—？），字兑之，湖南长沙人。北洋政府官僚，抗日战争时期曾充当伪华北编译馆馆长。他的文章题为《不以成败论英雄》，刊于《宇宙风》第十三期（一九三六年三月），文中说：“我们的民族乃是向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近人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这种惰性与上面所说的不论成败的精神，最有关系。中国人对于失败者过于哀怜，所以对于旧的过于恋惜。对于成功者常怀轻蔑，所以对于新的不容易接收。凡是古来成功的帝王，欲维持几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残害几万几十万无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时的慑服。……这些话好像都是老生常谈。然而我要藉此点明的意思，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服帖的。……总而言之，中国人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

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

〔11〕但丁参看本卷第413页注〔3〕。

〔12〕《DZZ》德文《Deutsche Zentral Zeitung》（《德意志中央新闻》）的缩写；是当时在苏联印行的德文日报。

〔13〕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政论家，著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二月十七日是海涅逝世的日子。

〔14〕勃莱兑勒（1901—1964）通译布莱德尔，德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考验》和三部曲《亲戚和朋友们》等。

〔15〕美术学校指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下文的“一个十八岁的学生”指曹白。

〔16〕《静静的顿河》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长篇小说，当时有贺非从德文译本第一卷上半译出的译本，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鲁迅曾为它写有《后记》（收入《集外集拾遗》）。

〔17〕两个年纪相仿的学生指当时杭州艺专学生郝力群和叶乃芬。

〔18〕木刻研究会指木铃木刻研究会，一九三三年春成立于杭州，发起人为杭州艺术专门学校学生曹白、郝力群等。

〔19〕卢那却尔斯基（ibUSj[Z[\HLMM，1875—19*常常樟N 艺批评家，曾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

〔20〕露西亚俄罗斯的日文译名。

〔21〕CP英语Communist 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CY，英语Communist Youth的缩写，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22〕××省指浙江省。

〔23〕南昌陷于危急的时候指一九三三年四月初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红军部队攻克江西新淦、金溪，进逼南昌、抚州的时期。

〔24〕福建人民政府参看本卷第16页注〔31〕。

〔25〕陀密埃参看本卷第235页注〔7〕。《法官》是他作的一幅人物画，曾收入鲁迅所译《近代美术史潮论》中。

〔26〕人凡即曹白。原名刘平若，江苏江阴人。一九三三年在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肄业，后被捕入狱，一九三五年出狱后曾任小学教师。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写完题目，就有些踌躇，怕空话多于本文，就是俗语之所谓“雷声大，雨点小”。做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后，好像还可以写一点闲文，但已经没有力气，只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觉醒来，日报已到，拉过来一看，不觉自己摩一下头顶，惊叹道：“二十五周年的双十节！原来中华民国，已过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岂不快哉！”但这“快”是迅速的意思。后来乱翻增刊，偶看见新作家的憎恶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顶浇半瓢冷水。自己心里想：老人这东西，恐怕也真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罢，性情即日见乖张，二十五年而已，却偏喜欢说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着什么；而且这摩一下头顶的手势，也实在可以说是太落伍了。

这手势，每当惊喜或感动的时候，我也已经用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犹言“辫子究竟剪去了”，原是胜利的表现。这种心情，和现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

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2〕，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

那时的剃发，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确是气闷的，但挂头故事却并不引起我的惊惧，因为即使我不高兴剃发，剃头人不但不来砍下我的脑袋，还从旗竿斗里摸出糖来，说剃完就可以吃，已经换了怀柔方略了。见惯者不怪，对辫子也不觉其丑，何况花样繁多，以姿态论，则辫子有松打，有紧打，辫线有三股，有散线，周围有看发（即今之“刘海”），看发有长短，长看发又可打成两条细辫子，环于顶搭之周围，顾影自怜，为美男子；以作用论，则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竿，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昨在路上，看见巡捕拿人，一手一个，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则一把辫子，至少十多个，为治民计，也极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谓“海禁大开”，士人渐读洋书，因知比较，纵使不被洋人称为“猪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辫，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觉得毫无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这是纵使生于民国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3〕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束。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自然，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

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4〕，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5〕。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不过吴先生这时却正在和公使蔡钧大战〔6〕，名驰学界，白纱布下面，就藏着名誉的伤痕。不久，就被递解回国，路经皇城外的河边时，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捞起，押送回去了。这就是后来太炎先生和他笔战时，文中之所谓“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7〕。其实是日本的御沟并不狭小，但当警官护送之际，却即使并未“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捞起的。这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骂，今年吴先生讥刺太炎先生受国民政府优待时，还提起这件事，这是三十余年前的旧账，至今不忘，可见怨毒之深了。〔8〕但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剪掉辫子，也是当时一大事。太炎先生去发时，作《解辫发》，〔9〕有云——“……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歿。《春秋谷梁传》曰：‘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越斲发’，（晋灼曰：‘斲，张揖以为古剪字也’）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文见于木刻初版和排印再版的《馗书》中，后经更定，改名《检论》时，也被删掉了。

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10〕，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凶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黄克强〔11〕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一书。系作者逝世前二日所作（未完稿），是他最后的一篇文章。

〔2〕张勋参看本卷第195页注〔34〕。段祺瑞，参看本卷第69页注〔4〕。张勋复辟，事前曾得到段祺瑞的默契。但复辟事起，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他便转而以拥护共和为名，起兵将张勋击败。

〔3〕义和团清末我国北方农民、手工业者等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组织。但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盲目排外。一九〇〇年，在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

失败。八国联军，一九〇〇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镇压义和团运动，联合出兵进攻中国，于八月十四日占领北京。次年清政府和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4〕吴稚晖参看本卷第108页注〔42〕。他早年曾留学日本。

〔5〕西太后即慈禧太后（1835—1908），满族，名叶赫那拉氏，清朝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即位，被尊为慈禧太后，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

〔6〕吴稚晖和公使蔡钧大战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间，我国自费留日学生九人，志愿入成城学校（相当于士官预备学校）肄业，由于清政府对陆军学生颇多顾忌，公使蔡钧坚决拒绝保送。于是有留日学生二十余人（吴稚晖在内）往公使馆代为交涉，蔡钧始终不允，发生冲突。后来蔡钧勾结日政府以妨害治安罪拘捕学生，遣送回国。

〔7〕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九号（一九〇八年二月）发表的《复吴敬恒书》中说：“为蔡钧所引渡，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犹欲以杀身成仁欺观听者，非足下之成事乎？”又在《民报》第二十二号（一九〇八年七月）发表的《再复吴敬恒书》中说：“足下本一洋奴资格，迨而执贽康门，特以势利相缘，……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壁大阍，忘其雅素……善箝而口，勿令舐痛；善补而裤，勿令后穿，斯已矣。

此亦足下所当自省者也。”（按吴稚晖投河被救后，在他衣袋里发见的绝命书中有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

〔8〕吴稚晖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发表的《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其中对于“献策”一事多方辩解，说是“本来尽有事实可以代明，然而章太炎吃了这番巡捕房官司，当然不比跳在阳沟里，他又能扯几句范蔚宗（按即《后汉书》的作者范曄）的格调，当然他的文集，可以寿世。他竟用一面之词，含血喷人。”在文末又说：“从十三年（按即一九二四年）到今，我是在党（按指国民党）里走动，人家看了好像得意。他不愿意投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好像失意……今后他也鼎鼎大名的在苏州讲学了。党里的报纸也盛赞他的读经主张了。说不定他也要投青天白日旗的下面来，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了。”

〔9〕《解辫发》作于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文中所说“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指一九〇〇年。公元前八四一年周厉王被逐，由共伯和代行王政，号共和元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正确纪年的开始。章太炎采用共和纪元，含有不承认清朝统治的意思。〔10〕“断发文身”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纹）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又《汉书·地理志》：“粤（越）地……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据唐代颜师古注引后汉应劭说：“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11〕黄克强（1874—1916）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近代民主革命家。他曾留学日本，与孙中山同倡革命，民国成立后曾任陆军总长。

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自说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正在经营出版，但出版家有一个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于原稿，因为纸张零碎，不寄来了，不过如果要说的话，却也可以补寄。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画，但在他的朋友手里别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于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

近两年来，大开了印卖遗著的风气，虽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人合作的，但这已不是先前的所谓“骸骨的迷恋”〔2〕，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余光，想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3〕。我不大佩服这些活家伙。可是这一回却很受了感动，因为一个人受了难，或者遭了冤，所谓先前的朋友，一声不响的固然有，连赶紧来投几块石子，借此表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并不算怎么希罕；至于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者，以我之孤陋寡闻，可实在很少知道。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到第二天付邮寄去，因为恐怕连累付印者，所以不题他的姓名；过了几天，才又投给《文学丛报》〔4〕，因为恐怕妨碍发行，所以又隐下了诗的名目。

此后不多几天，看见《社会日报》〔5〕，说是善于翻戏的史济行，现又化名为齐涵之了。我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骗，因为汉口的发信者，署名正是齐涵之。他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孩儿塔》不但不会出版，大约他连初稿也未必有的，不过知道白莽和我相识，以及他的诗集的名目罢了。

至于史济行和我的通信，却早得很，还是八九年前，我在编辑《语丝》〔6〕，创造社和太阳社〔7〕联合起来向我围剿的时候，他就自称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现了，投稿是几则当时所谓革命文豪的劣迹，信里还说这类文稿，可以源源的寄来。

然而《语丝》里是没有“劣迹栏”的，我也不想和这种“作家”往来，于是当时即加以拒绝。后来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谣言，或者忽又化为“天行”（《语丝》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别一人）或“史岩”，卑词征求我的文稿，我总给他一个置之不理。这一回，他在汉口，我是听到过的，但不能因为一个史济行在汉口，便将一切汉口的不相识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

今天又看见了所谓“汉出”的《人间世》〔8〕的第二期，卷末写着“主编史天行”，而下期要目的预告上，果然有我的《序 孩儿塔》在。但卷端又声明着下期要更名为《西北风》了，那么，我的序文，自然就卷在第一阵“西北风”里。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题目是《日译本 中国小说史略 序》。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写的，这里却不知道何人所译，仅止一页的短文，竟充满着错误和不通，但前面却附有一行声明道：“本篇原来是我为日译本《支那小说史》写的卷头语……”乃是模拟我的语气，冒充我自己翻译的。

翻译自己所写的日文，竟会满纸错误，这岂不是天下的大怪事么？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史济行的把戏，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

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希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成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

最后，我还要添几句由“多疑”而来的结论：即使真有“汉出”《孩儿塔》，这部诗也还是可疑的。我从来不想对于史济行的大事业讲一句话，但这回既经我写过一篇序，且又发表了，所以在现在或到那时，我都有指明真伪的义务和权利。四月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二期，发表时题为《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

〔2〕“骸骨的迷恋”原为斯提（叶圣陶）所作文章的题名（刊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十九号）。文中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骸骨的迷恋”就常被用为形容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

〔3〕“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这句话见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第一〇四回。

〔4〕《文学丛报》月刊。王元亨、马子华、萧今度编辑，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五期停刊。

〔5〕《社会日报》当时上海发行的小报之一，一九二九年创刊。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该报载有《史济行翻戏志趣（上）》一文，揭发史济行化名齐涵之骗稿的行径。

〔6〕《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〇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7〕创造社参看本卷第263页注〔66〕。太阳社，参看本卷第401页注〔2〕。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曾对鲁迅进行过批评和攻击。

〔8〕“汉出”的《人间世》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四月创刊，汉口中华图书公司发行。

共出二期（第二期改名为《西北风》）。因当时上海有同名刊物（林语堂编），所以加“汉出”二字。

